退休警察鍾建新 堅毅人生背後的水彩柔情

在一份將近21年前的政府新聞公報中，有一篇關於鍾建新的報道，標題名為《警隊人才濟濟——水彩畫家鍾建新》，當年仍是警察身份的他，已在水彩畫的世界中嶄露頭角。這樣說不怎麼準確，精準地來說，早在1977年，年僅14歲的鍾建新，就已然踏上過香港大會堂的舞台，拿了他的第一個有關美術的獎。

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

■鍾建新自小畫畫，畫了54年。

■《一家親》

■《天長地久》

■鍾建新與太太（左）。

■鍾建新與其學生王愛倫（左）。

■《油麻地》

「我自小畫畫，畫了54年，從幼稚園開始已經知道自己有畫畫的天分。1975年，我開始畫水彩，拿第一個獎的時刻讓我記憶猶新，當時的我走在高座的香港藝術館。我就想：我將來一定有個位置在這裡。」那一年的鍾建新看着香港藝術館裡的眾多畫作，暗自對自己這樣說道。

時間過得很快，16年之後，默默許下的這個對自己的冀盼，便成為了現實。

新畫作寓中國人文化

今年，鍾建新帶着他的學生王愛倫以及前新藝畫會會長陳明東，由即日起至17日於「畫好香港國際藝廊」舉辦畫展。這次的畫展以水彩畫為主，帶出了三人各自對於生活以及香港的不同感受。「畫展中有19張水彩畫，其中有10張是我的作品，最近的一張是2019年的作品。」鍾建新介紹道：「這幅有關麻雀的畫，主題是一家親。」鑒於香港為時超過半年的時局，他有感而發，「我畫了66隻麻雀在樹上。其實麻雀在樹上是會爭執的，但牠們也會一起唱歌，各司其職。不過，無論怎麼樣都好，牠們都是很團結的，是一家人。而我們中國人就像這些麻雀一樣，去到世界各地，他們都是希望『搵食』，是沒有攻擊性的。這就和麻雀一樣，對其他動物是沒有影響的。」他深感中國人也是一樣的脾性，由此創作出了這幅畫。

對於鍾建新來說，中國的文化是一個道德標準很高的規範，他認為就連周圍的許多國家也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，而我們自己的價值觀卻出現了一些變化。「中國人是可以很團結的，但有時也會如一盤散沙。這是取決於自己的決定，你要做一個什麼樣的人，一個中國人的特性不能代表所有人。」他說。

熱愛新界人事物

鍾建新對於新界的感情可以追溯到上世紀50年代。那時候，鍾建新的父親成為一名「拓荒者」，由九龍搬入粉嶺，買下了一個農場。小時候的他，便在這個由大自然縈繞着的環境中長大，對自然有種天然的感情和直覺。

「我覺得自己畫畫有個弱點，就是高樓大廈。」他覺得筆觸是有情感的，雖然扎實的畫功可以將眼前的石頭森林畫在紙上，但是「缺乏感情」。曾在元朗駐守的他曾深深感受過圍村人的真誠，是個有感情的群體。

「我對新界的感情很深，尤其是粉嶺。那裡很悠閒，雖然也有都市化，但是完全是不一樣的香港。」鍾建新覺得現在的香港社會會將人分化成不同的人，比如城市人和新界人，但他認為這種劃分是不自然的。

警察生涯影響深遠

畫家並不是鍾建新年輕時候的正職，他很早便加入香港警隊，一做就到了45歲退休那年。鍾建新曾說：「我從小便有兩個志願：一是做畫家，另一個是做警察。我的工作和興趣看似沒有什麼關連，但事實上卻關係極大。」與做畫家一樣，身為警察的鍾建新也有抱負。他曾在長達二十年的警察生涯中擔任過多項工種，不同的職位上讓他對這個世界的了解更多，他說：「我多了很多機會接觸這個世界，比如看到很多社會上千奇百怪、意想不到的事情，是其他行業不可能會有的經驗。」但令人遺憾的事情也很多，他自己親歷過無法營救企圖自殺的人，眼睜睜看着一個活生生的人跳樓，卻無法施救，「這種悲歡離合，是一直存在的。」他說。

警察的身份與作畫之間並不衝突，他在業餘的時間作畫，在當值的時候兢兢業業做一名好警察，「我也有很多其他同事會參加各種體育比賽，我只是和他們的愛好不同。」他自覺做警察令他擁有一種堅毅的性格，這讓退休後全心全意畫畫的他能夠克服耐心、細心的障礙，創作精緻的水彩畫。

香港的時局一直令鍾建新心有牽絆，他對一些群體對於香港警察的仇視感到難過，「我做過警察，一件事情的發生，不會令警察突然之間變成壞人，甚至『黑警』。但是你說是不是所有年輕人都有問題呢？我覺得不是，我見過的很多年輕一輩都很上進。」他痛心地覺得目前有些傳媒製造的輿論令香港社會產生「羊群效應」，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，「但我相信這些人是少數。」

那些偏頗的聲音，他覺得都很荒唐，他直言道：「香港警隊是我們的中堅，如果沒有了他們，這個社會就完了。」他在2014的時候便應邀為警隊畫畫，激勵和支持他們，而現在的他則認為，最好的支持便是遇到罪案便要立刻報警。

「我希望這個現狀可以逐漸改變。」他說。

警察的身份讓他感受榮譽，畫畫則是他最享受的事情，「畫完一幅畫，會讓我產生空虛的感覺，畫畫如果沒有這種感覺是超越不了自己的。」帶着堅毅的特質，他還會繼續畫下去，描繪香港的美好未來。

■鍾建新（中）與其學生王愛倫（左四）及陳明東（左三）共同舉辦畫展。

女建築師吳浩恩：不做花瓶水 但化天上雲

有成為建築師這個夢想的時候，吳浩恩還很小。跟着家人經過任職土木工程師的外公參與建築的大橋，聽到大家語帶驕傲地讚嘆，她懵懂地感到，這是一件有意義的大事，建築師這個種子就這樣埋了下來。

吳浩恩猶記得讀中學的時候，中文課上有這樣一篇文章，叫作《水的希望》。文中的那一滴不甘心終日遺留在一個美麗的花瓶中，奮身成功自由遨遊天際的小水珠，在她的心中一直揮之不去。「我要到外面的世界去，我要在太陽光下面閃着千變萬化的光，我要到永沒有盡頭的溪澗裡去，唱出自己願意唱的歌。」呂夢周筆下的那顆頑固的小水珠，直至近年，吳浩恩再研讀一次，方才悟到了其中深藏的含義。

近來，在美國求學、執業多年，已是知名建築師的吳浩恩為荃灣D．PARK愉景新城打造一方以日本室外彈床為靈感的室內兒童遊樂場，便不時想起那顆小水珠。「水有更大的理想。」文章對她的激勵很大，也同時帶去了靈感，「我在做這個設計的時候一直不斷聯想到它。」Puffy Park由水這個概念構成，成為了分別由雲的狀態構成的柔軟且堅韌的彈跳床、由雪的狀態構成的氣球，甚至根據愉景新城特有的天窗打造出的陽光折射。

「香港有興趣將日本在室外的彈床引入，但是因為室內室外的不同，有很多設計需要改動。比如在日本當地，處於室外的時候是和天然的地勢相呼應，但是室內沒有這個條件，所以怎麼才能夠讓設計統一一些？很多安全性、技術上都要做改動。」吳浩恩說。

■Puffy Park的設計靈感來自於水。

■吳浩恩從小就有成為建築師的夢想。

她自中學起便前往美國求學，因為覺得香港的教育體系是很早便要選科，她感到美國的學習更能接受較為「全面」的知識，「我覺得作為建築師，要對很多學科有一定的了解。」而學成之後的她一直希望能夠涉足遊樂場，尤其是自己成為媽媽後更甚，她認為遊樂場給人的感覺是很歡樂的，設計遊樂場是根據小朋友的眼光去做，這是很有趣的。她說：「當收到這個邀請的時候，我是很興奮的，第一時間就答應了做這個項目。」

絕不做「花瓶母親」

自認是個「很貪玩的人」，懷着孩子的童真當了媽媽，但吳浩恩絕對「不要做一個花瓶母親」，希望能夠成為小時候途經大橋上想像中那種「做出對社會有意義的事情」的人。「剛剛開始讀建築的時候，想做遊樂場的原因很簡單，就是覺得很快樂。」成為母親之後，吳浩恩覺得這份使命更大了，「這是第一個我可以將建築師和母親這兩個角色結合起來的項目，所以有很多位置會和自己『爭執』。」作為建築師，她當然希望有突破，但是作為母親來說，盡可能的安全才是第一考量。

現在的吳浩恩，眼睛裡顯然有一個母親的自豪，她希望自己不做一個過度保護的母親：「我小時候的遊樂場是比現在好玩的，那個年代的攀登架是有很強的幾何關係的，現在則感覺比較公式化。」她認為安全意識是其中一個原因，「社會上給予的各方面壓力越來越大，使家長越來越緊張。現在的小朋友沒有時間生病、受傷，過度保護的同時也流失了很多東西。」

「建築師是我的夢想。」吳浩恩很嚴肅地說。當想做建築師的種子播下之後，城市中的建築就變得不一樣起來，經過的香港不少的建築，她能夠辨認出建築大師貝聿銘的手筆。但是，這個夢並沒有得到父親的支持，甚至「派出」不同的親戚朋友來說服她。

「其實很有趣的，十五六歲的小朋友，哪裡知道建築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但當時就是有這一份執着。」因着這份執着，她早早便決意要前赴外國求學，學習更廣博的知識，所幸最終獲得了父親的支持，她回首再看，也很感謝家人的支持。

「建築是建設一個城市的基本，我能夠參與、成為這一部分，是很自豪的，這是我的『身份』。」她說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